

我的习书历程

□白描

我的家乡出过一个人物:于右任。于右任的老家乡斗口于村,距我家手巾白村5里地,孩提时,在秋日的风雨过后,我们村一帮孩子,常去斗口于村捡拾落果。那里有一片很大的果园,早于于右任在家乡搞农业改良试验,建了斗口农事试验场,果园那时就有了,引进了多种优良品种的苹果。新中国成立后斗口农场成了国营农场,那是我们孩子的向往之地,买果子要花钱,但捡拾地上的落果却不用,苹果有黄元帅、国光等,虽然落果大都跌破或有腐烂,却是不花钱的饕餮吃物,收获不会很多,但足以让我们兴高采烈。

我们两个村子,地处泾阳和三原两县交界处,早先归三原县辖,新中国成立后一会儿归三原,一会儿归泾阳,归属几经变动,现在属于泾阳地面。有人说于右任是三原人,那是老话,确切地说应该是泾阳人。泾阳地处三秦大地腹地,被誉为关中平原的“白菜心”,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原点就在离我家10里外的一处高地上。县西50里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寝九嵕山,形同笔架,人们叫它笔架山,县北30里是嵯峨山,五峰并峙,也形同笔架,人们叫它北笔架山。两架笔架拱抱泾阳,于是有了说道:此地必出文曲星。后来仅现代便出了于右任、吴宓、冯国璋、李若冰、雷抒雁等。

于右任早年在家乡致力于办学兴教,我的父亲曾在他开办的小学念过书。父亲曾回忆:于先生让人把桌子在操场一字排开,学生们写字,他逐一察看,见写得好的,便当众夸奖。父亲说,他的毛笔字曾受到于先生的表扬。于右任的鼓励,让父亲好不得意,后来他虽做了农民,刨挖

土地终其一生,但对笔墨依然心存眷恋,我刚识得几个字,他便把毛笔塞到我手中,说字是一个人的脸面,字不行,便颜面无光。他告诉我,于先生说过:“写好飞凤家,天下人人夸。”飞、凤、家三字最难写,他写了这三字,让我照着写。在我慢慢对写字有了兴趣后,家里泥皮墙上,到处都是我用钢笔写的“飞凤家”,还有一些类似口号的涂鸦。庄户人家里少不了麻袋、口袋类盛粮物具,村人拿取父亲在上边写名字,以作标记免得丢失,后来遇到这样的事,父亲就让我代笔。我很喜欢在口袋上写字,这是一种颇长袋字,用粗棉线编制而成,能装百十斤粮食。毛笔落在棉布袋上,比涂在土壤上的感觉要好得多。

古来家乡人便崇文重教,农民里,毛笔字写得好的人多不胜数。“文革”后“清理阶级队伍”,大队举办审查对象学习班,我刚返乡做了农民,便让我去做记录。审查对象里有个老地主,腰间挂一只粗布小袋,让他写交代材料,他便从腰间解下袋子,打开,拿出一方黄铜墨盒,一支细管毛笔,满把老茧的粗手却写得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,直叫人心里不由得赞叹。他的字我是喜欢得不得了,百读不厌,在我看来无异于法帖。学习班结束时,我偷藏了两份老地主的交代材料,一直保留在手里。

于右任已作古,父亲已作古,老地主已作古,但故乡的传统没有丢。故乡的书法家层出不穷,他们很牛,别人问:“你临谁的帖?”答曰:“没临过帖。”问者吃惊:“没临过帖字写得这么好?”再答:“我临碑哩。”西安有碑林,那是闻名于世的书法宝库,临碑比临帖听去更唬人。虽有吹牛的嫌疑,但得条件便利,可常去碑林接受浸礼,也非

班语。记不清我去过碑林多少次,上大学时5分钱门票,我不吃不喝在里边从早上开馆待到晚上清场闭馆。米芾讲:“石刻不可学,但自书使人刻之,已非己书也。故必须真迹观之,乃得趣。”也许米芾的话自有道理,但在我感觉里,碑刻的汉字穿艺术,读来更能使人心旌摇荡。

我常感叹天下字写得好的人是那么多,《三希堂法帖》32册,收录自魏、晋至明134位书法家的作品,只是乾隆年间内府所藏之精要,历朝历代官方民间还有多少书家可为法式楷模,那是一个说不清的数字。走到各地城市大街上,最吸引我眼球的是店铺牌匾,我一直固执地认为牌匾上的题刻,是一个城市文化底蕴的代表性符号,父亲说字是人的脸面,我以为牌匾是城市的脸面,一个城市的水有多深,看看大街上的牌匾,心里便大概有了数。有些匾额,字写得颇有气派,看署款,闻所未闻,让人心里直感叹散落在民间不知有多少高人。

字,本是一种实用书写符号,但汉字的魅力就在于可以独立成为一门艺术。古人解释:仓颉之初作书,盖依类象形,故谓之文,其后形声相益,即谓之字。汉字创造之初,形是第一要素,这形在数千年发展演进中,出落得活色生香,摇曳多姿。字因人异,不同的书家会有不同的书体,这便构成了书法艺术的恣肆汪洋。

我之习书,皆因兴趣,沉浸在翰墨书香中,实属人生之大乐趣。南朝书法家王僧虔讲:“书之妙道,神采为上,形质次之,兼之者方可为古人。”神采最难得。我一向认为,从汉字脱颖而出的书法艺术,不同书体不同造诣不仅给人不同的视觉印象,而且给人不同的审美感受。在这黑白对比的审美感受里,首要的是书法意蕴提供给观者的审美愉悦。激活这愉悦感受的酵母就是神采。我一直向往自己笔下有鲜活神采,也一直为之努力,但所得不多。每每看到别人字写得那么好,自己便沮丧得很,好在汉代赵壹一番话聊可自我安慰。赵壹讲:“凡人各殊气血,异筋骨,心有疏密,手有巧拙,书之好丑,在心与手,可强为哉?”喜欢,投入,就行了。

我的生活深陷于一座古老的内地县城——安陆。我之所以使用“深陷”这个词语,是因为我在这里一待就是30多年。结婚、生子,平庸地度过每一个白昼和夜晚。有一条名叫府河的河流穿城而过。我在1981年来到安陆的时候,府河还很清澈,现在早已浑浊不堪。这条河最终将流到武汉,并汇入长江。从安陆到武汉,下高速的地方就叫府河收费站。也就是说府河事实上像根藤蔓一样把安陆和武汉缠在一起了。提到安陆,当地人最为津津乐道的事情是大诗人李白曾在这里住了10年。他娶过一名许姓女子,生下两个孩子。但是李白并非久居安陆,他只是以安陆为家,四处漫游,住一阵子便出去,出去一阵子又回来。因为李白的缘故,后人谈起安陆历史都会有强烈的暴发户心态:“我们祖上有过李白!”李白因此成为安陆最体面的说辞。我出生在乡下——安陆的邻县广水,广水在地理上靠近河南,大大小小的山寨里从前出过数不尽的土匪响马。安陆不同,就性格而言,这里的人更温和,礼仪周全。就连饮食和服饰也都中规中矩。它们是我刚到安陆时的印象,这些印象随着时光的流逝已不断被改写。

毫无疑问,我在安陆是个“外来者”。即使在我深陷这座县城的时候,我仍然是被“植入”进来的异乡人,这样一种身份上的焦虑注定我只能是个旁观者。我生在广水花山镇,我祖父是当地的屠夫,当年政府修建飞沙河水闸,整座镇子葬身水底。我随父母迁居到母亲的娘家所在地——陈家棚子。那一年我3岁。也就是说,我在3岁的时候就成了“移民”。作为移民,我们家住的房子孤悬于村子北头,被称为“独屋”。这种称谓在我稍大时才明白,它确实带有歧视的味道。因为根基太浅,任何时候都不能跟祖居户抗衡。我目睹我的母亲每次吵架都会败于“大湾”里的人,旁边的人即使保持沉默也像是和他们联手在一起。异质的感觉长久盘踞在我内心,“我可能是和他们不一样的人”,童年时期的这种阴影并没有培育出敌意,但是培育出了怀疑和凝视。来到安陆以后,那种移民的感觉和童年经验高度契合。

我常常问自己,我的故乡在哪里?在广水的时候,我的故乡要么在花山,要么在陈家棚子。而现在我的故乡要么在广水,要么在安陆。我为此苦恼,因为需要思考“根”的问题。如果一个人有两个故乡,那么他还有故乡吗?尽管我看上去有两个故乡,但是我却不曾有“漂泊感”。在我看来漂泊有一种浪漫的东西在里面,它意味着远方以及动荡。而我作为移民实际上只是“深陷”,而不是漂移。即:从一个地方拔出,再植入另一个地方。从花山拔出,植入陈家棚子;再从广水拔出,植入安陆。

深陷于安陆,我看到一座县城的真实面目。从表面看,安陆就是一座麻将之城。人们如此热衷于打麻将,简直匪夷所思。所有餐馆里的餐桌旁配有麻将机,大部分宾馆的客房里也有。在私人家里,麻将机也是必需品。麻将之盛令人绝望。但这仍然是非常表层的现象,在它内部有更深远更盘根错节的纠葛,一旦切进去就能看到诸多真相。牌局必然和酒局连在一起,酒局从来都大有文章。然后是人,哪些人和哪些人一起玩麻将颇有讲究。圈子渐渐形成,圈子是需要资格的,不仅仅是钱的问题,还需要身份、名望。苦心经营某个圈子,高攀或退出。在哪个圈子接触到哪些人,很多事情平时搞不定,在办公室搞不定,但是在牌桌酒桌上却能轻松搞定。县城密布着各种关系,表面上看到的事情在背后完全是另外的样子。初来安陆时,感觉它温和以及礼仪周全。可是另一方面,安陆又是经常出现恶性罪案的凶险之城。在正常的秩序之外,还有另外的秩序,正常的等级之外也有另外的等级,如同有白昼就有黑夜。一层是真实的现实的县城,另一层则是遮蔽的影子的县城。许多时候,真实县城和影子县城能够叠合在一起。在里面待得久了,看得多了,才能将它们拆分开来。

我对我所生活的县城几乎烂熟于心,这在我是一笔财富。但是在刚开始写作的时候,我却不曾有意识去写县城。这是件很奇怪的事情,写作很可能需要保持一种“回望”姿态。当我在安陆县城回望,我所看到的必然是广水乡村。于是我虚构了一个名叫“烟村”的地方。真实的烟村处在我和老家和镇子之间,每次去镇上赶集,我都要经过这个盛产恶狗的村子。我把它真实的村名直接拿来,做了我虚构的村名。接下来我一直在经营这个村子,我把有关乡村的故事一股脑儿塞在烟村这只“布袋”里。这是一件很省力同时又很投机偷懒的做法,很多人都在这么做,因此这种做法变得似是而非,并最终将我厌倦。

有一天,我突然发现了县城的秘密。这次发现是人生的奇遇,奇遇多半都会猝不及防。那天我在安陆大街上行走,无意间邂逅了一张陌生人的脸。从那张极为普通的脸上,我认出了好多我熟悉和不熟悉的人的脸。这种“认出”在一瞬间令我晕头转向,我确信从他脸上看到了另外某人的脸,以及另外许多人的脸。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给它命名,“种子脸”?或者脸的“母本”?就在我胡思乱想之时,那人已消失不见,一张隐藏了众多脸的脸无影无踪。这时我想到了我深陷其中的这座县城。所谓对某张脸的发现只不过是期不期而遇的启示,安陆就是这样一座我在大街上看到的县城的“脸”。我在安陆内部看到了所有县城,在异地在其他县城我又能很清晰地认出安陆。为了确认这样一个不期而遇的发现,我专门走访了安陆周边的一些县城。孝昌、云梦、大悟、应城等等我都跑过。所有的县城都那么相似,街道、广场、商店和开发区,看上去如出一辙,全都是彼此的复制品。就连工地上扬起的灰土和建造的房子也都一模一样。县城和密人一样面目模糊,但是每个县城又是相对独立的。发现它的秘密我既欣喜,又沮丧。原来我的生存之地,竟是一个县城“标本”。

我想,如果把一座县城写明白了,很可能把所有的县城都写明白了,也就把一个国家写明白了,这实在是一种大胆而又令人振奋的推测。县城故事如此让人着迷,它里面有乡村的东西,也有城市的东西。有正面的看得清的东西,也有背面的黑暗的东西。如果你的想象是一匹野马,县城绝对是无边无际的草原。但真正开始县城叙事,需要契机。2012年夏天,我客居武汉。我一向既往是个异乡人。我往返于安陆与武汉之间,大约有一个半小时车程。行驶中,我有机会遥看和回望两地。更重要的是在客居地之武汉,我能够更有效地回望安陆。安陆故事于是汹涌而至,县城叙事于我而言显得那么迫切,那么重要。我翻来覆去地讲述那些故事,不想把故事讲得精致,只想讲得丰富。在故事结束的地方,或者在故事分歧的地方,一定还有新的故事。故事在滚动,在延伸,在繁衍,它是故事的某种形态,也是县城固有的生态。县城就是这样,永远都有故事。

在我讲述安陆故事的时候,我会觉得我是它上面的一块“补丁”,异乡人是我真实的存在。当我通过写作试图说出县城里的秘密时,我的内心其实是想和安陆融为一体。

深陷于县城里的秘密叙事

□曹军庆

泰山石敢当

□厉彦林

“五一”前,我有幸来到“五岳独尊”的泰山脚下。清晨,沿岱庙走到红门,沿街的门店里摆着琳琅满目的泰安特产,最夺人眼球的是大大小小的泰山石,大都刻有红漆字“石敢当”,有的粗糙笨重,有的精细灵巧,让人目不暇接。我询问那位头发花白的店主:大爷,这“石敢当”能干啥用呀?他理了理胡须,笑着说:“镇宅辟邪,保平安呗。盖新宅子,就得立一块或埋一块。立石时要自家培土,不让外人看见,那才叫灵!”

我查字典、翻资料,寻根求源。“石敢当”是远古人们对灵石崇拜的遗俗,《辞源》中解释:“唐宋以来,人家门口,或街衢巷口,常立一小石碑,上刻‘石敢当’三字,以为可以禁压不祥。”史游曾在《急就篇》(章)有记载:“狮猛虎,石敢当,所不侵,龙未央。”“石敢当”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样式,有浅浮雕的,有圆雕的,有刻有八卦图案的,有只在石头上刻字的。据考证,“石敢当”之前加泰山,叫“泰山石敢当”,应始于明代,流行于清代,传至今日,其意是借神圣的泰山以增石敢当之威力。

“泰山石敢当”以石刻为有形载体,与无形的历史传说、民间故事同体存在。传说泰山脚下有一个人,姓石名敢当。此人家境贫寒,靠打柴为生,自幼喜欢舞刀弄棒,武功高强,好打抱不平,在泰山周围名气很大。泰安南大汶口镇曾有一户张姓人家,女儿年方二八,长得非常漂亮。每到太阳压山时,就从东南方向刮来一股妖气,刮开她的门,上她屋里去。天长日久,女孩面黄肌瘦,很虚弱。张家老人心急如焚,听说石敢当很勇敢,就骑上毛驴去请他降妖。石敢当慷慨应允,并作了充分准备。天黑后,从东南方向刮来一阵妖风,石敢当用脚猛地将热铜炉踢扣在妖精头上,约定的童男童女一齐敲锣打鼓。妖怪顿时头昏脑涨,吓得一气窜到福建。后来福建又有人被妖风缠住身体。怎么办呢?经多方打听,就把石敢当请去了。妖怪一见,又跑到了东北。东北又有个姑娘得了这个病,又来请石敢当。石敢当就想:我拿他一回,他就跑得远,山南海北这么大地方,我也跑不过来呀。于是就和对人说说:“这样吧,泰山石头很多,我找石匠刻上我的家乡和名字‘泰山石敢当’,你回去把它放在墙上,那妖就吓跑了。”从此这降妖的办法就传开了,谁家盖房子、垒墙的时候,总是先刻上“泰山石敢当”几个字垒在墙上的显眼处,就可以镇妖避邪。

“泰山石敢当”不单是美丽的传说,有其历史的必然。细数起来,我国历史上一直是个农业大国,长期以来又是宗法制的社会结构,有理石以镇之习俗。泰山崛起于黄河下游的冲积大平原,突兀挺拔,给人以格外巍峨险峻的视觉冲击。“泰山石敢当”石碑、石刻,不仅是“平安”的象征,更有“无声保镖”、“止煞祈福”的意味,给人以信心与力量。“泰山石敢当”走遍我国大江南北,甚至海南岛的天涯海角。在广袤的乡野农村,许多民居墙壁朝街那面的上方,都端正正地镶嵌着一块石头,上面雕刻有“泰山石敢当”五个字。“泰山石敢当”还成了中国的和平使者,传播到了日本、朝鲜、韩国以及东南亚的泰国、马来西亚、马六甲等地,甚至也传播到了欧洲和美国的唐人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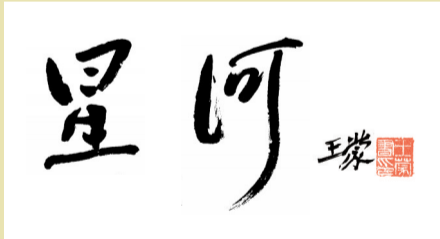
“泰山石敢当”源于人们灵石崇拜的遗俗,属于中国的镇物辟邪文化。所追求的“吉祥平安”,体现了人们普遍渴求安居、太平、昌盛、福康的愿望。“国泰民安”,国泰和民安互为依存,国泰民才得以安,民安国才得以泰。一块普普通通的泰山石,守护着群众战胜邪恶的愿望,担当着保护百姓平安的使命与责任,如此神威,令人敬畏。

凡爬过泰山的人一定记得十八盘。从松山谷底至南天门的一段山路叫“十八盘”。全程不足一公里,垂直高度却有400余米。盘道两侧崖壁如削,题刻遍布,远望如天梯高悬。不攀登十八盘,理解不了什么是艰苦、艰难和毅力的含义。爬泰山十八盘,最考验和挑战你的恒心和意志力。只有咬着牙一步一步勇敢地攀登,才能抵达至美的境界。

我们在剧烈的心跳中,气喘吁吁地登上南天门,“天门一长啸,万里清风来”。我陡然觉得,每位登泰山者都是石敢当:怀揣着信仰,不畏辛劳,自强不息,彰显正气凛然,当仁不让的豪气,挺拔起生命高度和人生纯度。



吴冠中作品



闲话士人

□孙青瑜

前几天,在微信上看到一篇微文,发现作者在文章中“士”解释为“知识分子”,这种解释显然是不准确的。

“士”的含义很多,比如勇士、壮士、军士、隐士、武士、贤士、志士、道士、学士、女士等等。《诗·邶有苦叶》中说:“士如归妻,迨冰未泮。”说的是小伙子迎娶要在寒冰融化之前。“士”一般多指男人,加上“女士”,便是指人,常常和定语联用,指特殊的人群,如术士、方士、谋士、战士等等。《诗·清庙》中说:“济济多士,秉文之德。”战国,高级官吏泛称为“士大夫”。除此,它还能指“狱官”,以及地位不高的普通官吏。

《左传》中载:昭公七年,人有十等:王、公、大夫、士、皂、舆、隶、僚、仆、台。“士”作为其中一个阶层,自然有它特定的规范,比如衣食住行、婚嫁娶嫁,都与其他阶层有明显的区别和规定。《庄子·天下》载:古之丧礼,贵贱有仪,上下有等,天子棺七重,诸侯五重,大夫三重,士再重。《荀子》中说:天子穿红色的龙袍,诸侯穿黑色,戴冕,大夫穿次一等的衣帽,士戴白鹿皮帽。而士的来源,一般有三个渠道:一是王、诸侯、卿大夫的庶出后裔,二是庶民中的优秀分子,三是士人的嫡出长子也可以继承为士。

历史上除了春秋时期的士人阶层雄壮之外,魏晋时期的士人也不简单,如何晏、稽康、张华、潘岳、陆机、陆云、郭璞、谢灵运、鲍照等,多为精通“三玄”的饱学之士,也是魏晋玄学的中流砥柱。如何晏、王弼、稽康、阮向秀、郭象等一大批玄学家。除了玄学一脉,魏晋士人还掀起了“隐逸之风”,其代表人物为谢灵运,后来又出了一个陶渊明,将中国士人的隐居热情推得

高涨好多年。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隐士到底有多少,无法统计。

到了魏晋时期,文士的数量不但猛然增加,还出了很多饱学之士,这些学士不但饱学,还有很多都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“角儿”,其影响力自然就盖过了其他士人。也正是文士人数的火速增加,以及他们在文化史上的显著成就,才造成后人单凭感觉而对“士人”二字断章取义。

我再查了“百度词条”,又看到易中天在博文中对士人的解释,发现都是不准确的答案。

士人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阶层,不但人员结构广博而杂,社会地位也参差不齐,绝不是单指知识分子。为了区分不同的士,当时的人便开始对士进行分类。根据“士”的特点、社会地位等情况,大体可分成三大部分:一指指武士、侠士和力士。二是指各种文士。三是指低级官吏。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载:“士师不能治士,则如之何?”“士师”为高级司法官,“士”则为较低级的属官。当然,还有一些难于归类的,如“勇士”、“国士”、“秀士”、“俊士”、“烈士”、“豪士”、“车士”、“都士”等等,士人结构之复杂,分布面之广,一直是春秋战国以来最为活跃的一个阶层。《荀子·王制》:“农衣,士士,工工,商商。”《孟子·离娄下》:“无罪而杀士,则大夫可以去;无罪而戮民,则士可以徙。”当然在诸子书中,也有在“士”中再分等级的记录。如《墨子·节葬下》载:“上士之操葬也。”所谓“上士”,显然是别于下士而讲的……这一系列的文献资料都在告诉我们,“士人”的团体结构一直都是很复杂的,“知识分子”四字岂能“括”之?